

各国都有自己的长处。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这些成果就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祖国的一部分的四川，在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就古代四川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一)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勤劳聪慧的四川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出许多精美名贵的产品。这些珍品不仅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传至国外，对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汉武帝时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来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一带）。在这里，张骞见到了四川的名产品。后来，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正义注：“邛都邛山出此竹，固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布，土芦布。”①邛都即今四川西昌一带，以此地之竹制成杖，即为邛杖。土芦布，一般认为是木棉布。这两种特产由四川输往身毒（印度），再转运大夏。

四川出生漆。“陇、蜀之丹漆旌羽，……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②古代四川人民以漆为原料，生产出精美的漆器。汉代，四川漆器闻名天下。汉朝廷在广汉设工官，专门制造漆器和金银扣器。不仅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汉墓中出土了不少成都制造的珍贵漆器，而且早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朝鲜原乐浪郡（今平壤附近）就出土了大量有铭文的汉代漆器，其中有当时蜀郡产品。这是四川漆器输往国外的有力证据③。

汉代的四川不仅通过陆路与外国发生贸易往来，而且可能通过水路与国外贸易。至迟成书于汉代的《禹贡》称梁州（今四川等地区）出铁和镡。镡是可以雕刻器物的钢铁。由于有这个传统，汉代蜀刀是天下名牌产品，西汉文翁曾“买刀布蜀物，资计吏以遗博士”，因“二者蜀人作之皆善”④。东汉初，大秦（罗马）已有中国钢铁。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27—79年）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钢铁大加赞美，认为是优良卓越的产品⑤。这种产品很可能是四川的。而当时由于北匈奴扼西域通道，中西陆上交通阻塞，因此有的史家认为，“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从水路私运出海。”⑥

四川盆地西部古称为蜀。蜀是我国最早养蚕的地区之一。四川丝织业历史悠久。古代四

川输往外国的产品中，数量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丝织品，而其中尤以蜀锦为第一。

三国时，蜀锦在蜀国的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⑦通过曹魏，蜀锦转运日本。《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说：“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皱粟罽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斑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

唐代，四川丝织品输出数量更大，往西沿着丝绸之路输往中西、西亚、欧洲。一九一二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桔瑞在新疆吐鲁番盗掘唐墓，出土联珠对鹿斜纹纬锦一件，锦中织有“花对鹿”铭文，此即蜀锦^⑧。日本大谷敦煌文书3091号记有“帛练行梓州小练一匹，上直钱三百九十文，次三百八十文，下三百七十文。”梓州即今四川三台。“无数铃声摇过迹，知驮白练到安西”。梓州白练在西域市场上能得如此高价，那么骆马所驮，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四川丝织品。往东，蜀锦大批运往日本。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献纳宝物帐》上记有“蜀江太子御绢伞”、“蜀江小幡”等物，该寺还存有唐蜀锦残片，可见蜀锦在日本被视为宝物。唐时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小说》“游仙窟”中提到“益州新样锦”。这可能是指“陵阳公样”。唐太宗时，益州工官窦思伦组织工人创造章彩奇丽的锦和绫的新花样，流行国内外。后窦被封为陵阳公，这些花样就被称为“陵阳公样”。

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眼》中说：“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巴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这说明当时川丝作为外贸产品原料大量送至沿海，经加工后再行出口。

（二）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四川人民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许多精湛的技术。这些奇技，先后传至外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四川很可能是我国印刷术的发祥地。唐末四川印刷业已十分发达，是当时我国印刷业的中心。四川的印刷品和印刷技术在唐代就已传至外国。865年（唐咸通六年），日本僧人宗叡从中国返回日本时，带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⑨。所谓“西川印子”，就是四川的印版书。清末在敦煌发现唐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樊赏家历（下残）”，这是四川印刷品输往西方的明证。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说，敦煌发现的三件书卷，大致是九世纪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的东西，它们“可能来自四川省”。他又认为，“敦煌发现的《切韵》残叶，被认为是当时四川世俗方面早期印刷活动的产物。”^⑩这些材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四川印刷术的西传提供了线索。

宋初，在成都刻印《大藏经》，共收佛经典籍一千五百二十一种，五千余卷，雕板十三万块，历时十余年之久。这部印刷品被外国学者誉为“历史记载上最不朽的典籍之一”^⑪。995年，高丽国王派遣韩彦荣来华，要求宋赠送蜀刻《大藏经》，宋朝政府赠送一部。1101年（高丽显宗二年），朝鲜开始翻刻《大藏经》，至1082年完成。983年，日本东大寺僧人裔然及弟子三人入宋学习、研究。三年后回国时，宋赐赠蜀刻《大藏经》一部。

明末清初，四川绵竹兴起了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木刻年画。绵竹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我国四大年画。绵竹年画不仅遍销我国西南、西北，而且远销印度、缅甸和东南亚各国。

在农业科学方面，古代四川人民对世界文化也有很大贡献。四川西部是大麦的发祥地。早在1933年，瑞典人欧伯希即在四川道孚县发现野生大麦，并据此提出我国四川和西藏是大麦发祥地的看法。不过当时没有得到充分证实。1974年，我国科学家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以及西藏一些地区，都发现野生大麦，从而证明这一带是大麦的发祥地^⑫。我国古代四川、西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驯化和培育出了大麦，丰富了人类的粮食品种。四川的种茶技艺和饮茶习惯对国外的影响亦很深远。我国西南是茶树的原产地，而四川是我国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方。西周初年，已有人发现巴蜀庭院中有人工栽培的茶树。《神农本草经》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事”。可见饮茶习惯也是从四川传出去的。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全国。而世界各国的种茶技术、饮茶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四川传出去的。至今“川红”还畅销国外。

四川井盐生产历史悠久，为向深藏地下的盐卤要盐，四川人民创造和发展了盐井开凿技术。宋代，四川井盐工匠已能打出井口小如碗，深达数十丈的卓筒井。这种井是近代盐井、气井、油井的雏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种打井法传至西方，至少在1900年以前，世界上的油井、气井、盐井都是按卓筒井法打成的。

蜀道素以险阻著称，四川西部山高峡深更是难以通行。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四川人民，为沟通两岸交通，在深谷急流上梁设笮桥。笮桥就是绳桥，不过这一带以竹为绳，而“竹绳谓之笮”^⑬，故称笮桥。索桥何时传至国外已无从考察，但这一技术为中国四川西部地区首创，却是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这种技术，今天在桥梁和其他工程建设中仍广泛地使用。

古代四川人民对人类健康有一杰出贡献，那就是首创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关于种痘法，“究其所源，云自宋真宗时，峨眉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其说虽似渺茫，然以理揆之，实有参赞化育之功，固时制宜之妙^⑭。”朱纯嘏亦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种痘后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⑮。而且把为王旦之子种痘过程说得更详细，不过朱说时间在宋仁宗时代。真、仁二宗相去不远，二说时间出入不大。这就表明四川地区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已发明人痘接种技术，以后推广到我国各地。十七世纪末，俄国人从中国学去种痘法。后此法又经土耳其传至英国。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牛痘接种法。他的试验是1796年5月取得决定性成功的。从此种痘法更科学安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到种痘法的故乡中国。今天，肆虐多少世纪的天花已在全世界消灭，这是人类战胜疾病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硕果。

(三)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人员往来是一种重要方式。在汉代的中印蜀布、邛杖贸易中，印度和四川的商人可能就有来往，不过史籍中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姓。

唐代以降，四川与国外的人员往来猛增，其中不少有明确记载。

唐代高僧玄奘虽非四川人，但他青少年时代在成都度过了几年学习生活，打下了学问的

基础。玄奘游学印度时，以博学著称，深受当地僧俗尊敬。他对四川和印度文化交流似应有一定作用。唐代益州明远、会宁、义朗三法师，分别从海路出国，到过爪哇、缅甸、柬埔寨、印度等国。会宁法师曾在河陵国（爪哇）停住三年，“遂共河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事，斯与大乘涅槃颇不相涉”^{①⑥}。会宁派小僧运经把译经送回国内，先至交州，又至京师长安，奉奏朝廷，以后流布华夏，对小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成都沙门光远游学印度回国，带有西天竺王子给宋朝皇帝的信件和礼物，信中表述了增进两国友谊的良好愿望。

唐谚曰：“扬一益二。”唐以至宋代，成都是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来成都和四川的外国人也比以前大为增加。

唐代安附国及其父安舛汗，“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信”^{①⑦}。贞观年间，父子先后为维州（四川茂汶县）刺史。五代时，波斯人后裔石处温，在孟知祥、孟昶手下任职，“广事耕垦，常积谷数千万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千万石，加之以宝货”^{①⑧}，受到奖赏和提升。这个时期在四川长住下来的外裔人中，最知名的要算李珣兄妹。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人”^{①⑨}，知医药，善诗词，有《琼瑶集》，今存三首。四弟李玘，字廷仪，随唐僖宗入蜀，喜道家丹药，善奕棋。妹李舜弦，蜀王衍纳为昭仪，也善诗词。

宋代有大秦（罗马）人在成都造大秦寺。赵清献《蜀郡故事》里说：成都石笋街“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②⑩}。吴曾解释说：“盖大秦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人所建也”^{②⑪}。建寺的大秦人很可能是珠宝商人。历史上，在四川经商的外国人是不不少的。南朝人何妥，字栖凤，父是“细脚胡”，通商到四川，后定居在郫县。《高僧传》第二集第36卷还记载了释道仙（僧仁）的事迹。这个康居国（今苏联中亚一带）人，“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赏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后他行贾四川梓州时，沉财江中，辞别妻子，出家为僧，住灌口山竹林寺。

四川新都县新繁镇西八华里，有龙藏寺。此寺始建于唐，重修于清朝康熙年间。朝鲜驻清朝使者崔性麟曾到此游览，留下一草书碑刻，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四）

四川人民不仅富于创造精神，也善于学习，他们从其他国家人民那里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文化生活。

农业：“自古农桑甲天府”。四川农业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四川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也与吸取外国先进技术，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密切相关。胡桃（核桃）、胡萝卜（红萝卜）、葡萄等引自西域。棉花从印度经江南传入四川，元初的王桢在《农书》中说：“（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駸駸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红苕（甘薯）、包谷（玉米）、蕃茄（西红柿）、烟草等是由美洲经南洋或印度支那，传至我国南方沿海，再传入四川的。到清代，包谷、红苕已成为四川仅次于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了。清代四川什邡人张宗法在《三农纪》（成书于1760年）中对红苕曾详加研究，指出它的多种食法：“可生食、蒸食、煮食、煨食，可切片晒干，收贮作粥食，可磨粉，可饴饬，可酿酒，其制甚多”。

工业：早在唐代，四川的制糖业已有相当规模。不过当时全国制糖技术都不太高，只能生产红砂糖。647年，唐太宗派人到摩揭它（天竺属国，今印度境内）“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汁如其法，色味愈西域远甚。”^②约776年，住在四川遂宁的邹和尚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改进，制出“糖霜”。宋代四川遂宁人王灼在《糖霜谱》中说：“先是唐大历年间，有僧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一日驴犯山区黄氏者蔗田。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窰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汝，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宋应星称邹和尚为“西僧”^③，不知有何根据。但中国（特别是四川）学习印度制糖技术又加以发展，取得很大成效却是可以肯定的。

医学：四川药物资源丰富，自古医学发达。在四川古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外国医学的长处。以药物来说，李珣著《海药本草》六卷，收入外来药一百多种，丰富了中药种类。宋代四川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中，也收录了不少外来药。

艺术：佛教很早就传入我国、传入四川，峨眉山成为四川和全国的佛教胜地。佛教艺术对四川文化影响很大。峨眉山万年寺的普贤骑象铜铁铸象、乐山高七十一米的大佛以及大足石窟艺术这些珍品，都是中外艺术交流的结晶。随着佛教艺术的传入，作为佛教主要建筑物之一的塔（浮图）的建造技术也传入四川。隋初西蜀有益州（成都）福感寺塔、雒县（广汉）宝兴寺塔、江原（崇庆）等众寺塔三座大石塔，以后隋代四川各地又续有建造。唐代兴起砖塔，现存的彭县龙兴塔可能是唐代后期原物。至宋以后四川佛塔那就更多。座座佛塔，点缀在巴山蜀水之间，为秀丽的四川风光增色不少^④。

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闭关自守政策，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受到影响和破坏。但是，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四川的一些有识之士仍在艰难中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活人有奇术”^⑤的近代四川名医唐宗海（蓉川、融川），彭县人。他以西医的解剖理论印证中医理论，著有《中西汇通医学精义》，力国把中医西医统一起来，成为我国早期中医学习西医的代表人物。更值一提的是牺牲在戊戌政变中的六君子之一、四川富顺人刘光第，他不仅看到外国技术的长处，也看到它的短处，他主张学外国要“收其利而制其害”^⑥。这个观点，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注：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②《盐铁论·本议第一》

③梅原末治：《支那汉代记年铭漆器图说》，参据《考古》1975年6期《马王维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引文

④《汉书·循吏传》

⑤⑥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第114—115页

⑦山谦之：《丹阴记》

⑧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注⑮

⑨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等目录（大藏余

二），转引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影响》第43页

⑩⑪美国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译本）第57、59、76页

⑫参见佟振亚：《农作物史话》第31—33页

⑬《太平御览》卷711引文

⑭《医宗金鉴》卷六十《幼科种痘心法要旨》

⑮《痘疹定论》

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⑰《全唐文》卷435《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

⑱《粤雅堂丛书》路振《九国志》卷九

⑲何光远：《鉴诫录》

（下转92页）

总数的大约数目，一般是举出整数，省略余数；有的比实际数目多，有的又比实际的数目少。它是作者概括事物的一种手法，其目的是使文字精练。这种类型，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又称为“整数”。

数目字除开实数、虚数、成数三种类型外，还有一种类型：从文字看是数目字，而含义却不是真正的数目字。如“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杜甫《石壕吏》），这里的“一”，应当与“何”连为合成词。“一何”相当于现代汉语“多么”的意思。这个词，早在杜甫以前，就有诗人用过了。《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的句子。还有一个“壹”字，在古籍中经常和“一”通用，实际上是副词。如：“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礼记·檀弓》）这个

“壹”字，作“实在”、“的确”解。这种类型既不是实数或虚数，也不算是成数。我将它暂定一个名称叫“零数”。尽管这个名称不一定恰当，但它不属于实数、虚数、成数的类型和范围是肯定的。

此外，数目字“一”不但有时用作副词，有时还用作动词或名词等。如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六王毕，四海一”。这个“一”的词义是统一，就是动词。又如《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厓朔东，一厓雍南。”的“一”，就是名词，是“一座山”的省文。这些都是词类的活用。因此，数目字既有虚数、实数、成数几种类型，还有文字是数目字但实际的词义不是数目字这一类型。



美国戈申学院学生来我院学习

由美国戈申学院艾特利·比奇教授和他的夫人威尼弗雷德·比奇带领的二十名外籍学生，最近来到我院学习。我院文科各系将为这批外籍学生开设《基础汉语》、《中国历史概况》、《中国文化发展概况》、《中国政治经济概况》等课程。本院教师和有关方面专家，还将为他们作《成都地区的风土人情》、《鲁迅诗歌简介》、《中国的戏曲艺术》等学术报告。学习期间，还将组织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日进行各种参观活动。（邓奎金）

（上接75页）

- ①②《能改斋漫录》卷7《杜“石笋行”》
- ②《新唐书·西域列传》
-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
- ④参见林向：《四川唐宋塔初探》（四川大

学历史系油印本）

- ⑤刘光第：《哀圣斋诗集》《送唐融川大令宗海之任来宾》
- ⑥刘光第：《哀圣斋文集》《赵化镇牛痘局记》